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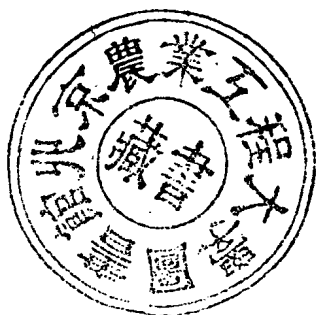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

3263/16

内 容 提 要

为密切配合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适应高等学校对广大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的需要,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和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根据国家教委党组的要求组织编写了本书。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对由学潮到动乱到暴乱的这场政治斗争的真相与实质、产生的国内外背景与条件、所涉及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分析。该书内容观点鲜明,线索清晰,资料丰富,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有助于读者认清这场斗争的真相,明辨是非、吸取教训、提高认识。

按照国家教委有关文件规定,本书用作高等学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制教育的专题教育材料,供各高等院校组织学习。同时,也为关心和研究这场政治斗争的广大同志,提供了一本有重要价值的读物。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6次印刷

印数2 180 051—22230 060

ISBN 7-04-002769-0/Z·16

定价 1.90 元

(内部发行)

编者说明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一书，是根据国家教委党组的要求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和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参加这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北京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干部。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杨瑞森教授作了统稿和修改。本书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最近发生的这场动乱和暴乱作出较为系统的回顾与反思，以便为高校师生的政治学习提供一本内部专题教育材料。

最近发生的这场风波，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内容极为丰富，教训十分深刻。而对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则尚须一定时日。本书旨在配合当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师生思想上存在的一些疑点和难点，力求为正确认识这场政治斗争提供一些较为详尽的事实和背景资料，以及基本的思路 and 观点。鉴于书中所引的有关学生的材料较多的是北京高校的情况，因此，各地高校在向师生进行宣传教育时，可结合本地区和本学校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

在编写过程中，有关单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也吸收了一些同志近期发表的有关论著中的研究成果。为了对高校青年学生有效地进行法制教育，我们还将北京市司法局编发的《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有关法律、法规摘编》全文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第三部分。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这样一本读物,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于时间匆促,学习研究不够,书中缺点乃至错误定所难免,恳望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八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真相	1
一、动乱的由来和形成.....	2
1. 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3
2. 极少数人利用悼念活动挑起动乱.....	8
3.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19
二、动乱的扩大和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23
1. 赵紫阳同志对动乱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4
2. 极少数人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30
3.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45
三、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平息.....	49
1. 天安门广场成为各种敌对势力和非 法组织活动的大本营.....	50
2. 极少数人阻挠和破坏戒严,挑起反革命暴乱.....	58
3. 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	62
第二部分 这场风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71
一、这场风波有深刻的国际和海外背景.....	71
1. 外国政治势力长期的精心策划和直接插手.....	72
2. 台港反动势力肆意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82
3. 利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形势, 混淆视听,乘机捣乱.....	85
二、这场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 我国长期泛滥的结果.....	87
1. 改革十年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 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	87

2.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这场风波前夕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91
三、这场政治斗争的社会基础与特点 ·····	95
1. 阶级斗争的激化与多种政治势力的介入·····	96
2. 斗争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	98
3. 这场政治斗争的若干特点·····	100
四、这场风波的产生与党和政府自身工作 失误的关系 ·····	102
1.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战斗力严重削弱·····	103
2. 腐败现象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存在,引起群众普遍不满·····	105
第三部分 动乱和暴乱是对民主与法制的极大破坏 ·····	109
一、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混乱 ·····	110
1. 宣扬超阶级的民主观,美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110
2. 幻想立即实现高度民主,对我国现实盲目不满·····	113
3. 法制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泛滥·····	114
二、动乱和暴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	116
1. 反对宪法中规定的根本社会制度,否定和 取消四项基本原则·····	117
2. 制造谣言,蛊惑群众,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煽动·····	118
3. 建立非法组织,组织非法活动,严重妨害社会治安管理·····	119
4. 违反戒严令,勾结社会渣滓,进行打、砸、抢、烧、 杀等刑事犯罪活动·····	120
5. 与国外境外敌对势力相串通,阴谋颠覆 我国社会主义政权·····	121
三、社会主义民主制建设只能在法制轨道上进行 ·····	122
1. 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制 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122
2. 社会主义民主制建设只能在法制轨道上进行,	

离开法制必然导致动乱·····	127
3.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 历史过程,决不能急于求成·····	131
4. 民主与法制建设要靠党和人民共同努力, 大学生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134
附录 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有关法律、法规摘编·····	137
第四部分 在反思中醒悟和奋起·····	148
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和始终一贯地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	149
1. 振兴中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49
2. 理直气壮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55
3. 努力提高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	160
二、清除腐败,惩治“官倒”,把改革开放 搞得更稳、更好、更快·····	164
1.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65
2.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清除腐败,惩治“官倒”·····	170
3. 治理整顿是为了把改革开放搞得更稳、更好、 甚至于更快·····	173
三、在自我反思中振奋精神,面向未来·····	176
1. 明辨大是大非,端正政治方向·····	177
2. 正确认识自我,警惕“捧杀”伎俩·····	183
3.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191
4. 振奋精神,面向未来·····	196

第一部分 从动乱到 反革命暴乱的真相

1989年4月中旬至6月上旬，北京掀起了一场风波，它波及到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一时间，高校内外群情激昂，街头巷尾众说纷纭。各种政治势力和持各种思想观点的人，都在这场风波中以自己的言行表明了态度。现在，风波已经平息，人们从激情议论转向冷静的反思。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风波？它是怎样形成的、发展的？……

大量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已为事态的发展证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深入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实质，首先需要简略地回

回顾一下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

一、动乱的由来和形成

这场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正象邓小平同志讲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外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的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战略相呼应，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期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的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由悼念胡耀邦同志引起的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政治动乱的性质。这一阶段，他们的政治纲领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提出这两条政治纲领的险恶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采用种种极其卑劣的手法，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企图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的煽动和组织下，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区很快出现了动乱局面。《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它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1. 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们推行“和平演变”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化”的政策。他们培植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即背叛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借“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变化，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近几年来，他们更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加紧了 this 战略的实施。

对待中国，他们也同样采用了这一手法。他们竭力支持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一类政治反对派，培植王炳章、胡平等人在美国搞起来的“中国民主联盟”，利用国际人权、国际大赦组织多方向我国政府施加压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一些人把我国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入组建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人，看成是对中国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关能起潜移默化影响的“智囊”人物，不断在他们身上下功夫，经常邀请他们以“国际访问者”名义去美国考察，甚至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援助，以期通过这些人在中国推行“自由化”政策。

正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拉拢、利诱下，国内外、党内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

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压制、打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许多同志，信任、重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少数人，组成“智囊团”，使几年来时起时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他们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据重要岗位，上下勾结，内外串通，长期进行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精心策划，并等待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到来，以挑起事端，制造动乱。

电视片《河殤》是他们舆论准备的重要步骤之一。《河殤》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它肯定了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87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这后一个“新纪元”是什么样的“新纪元”呢？用《河殤》的话讲即用“蓝色文明”取代“黄种人的文明”的“新纪元”。它挖空心地咒骂“黄种人文明”，说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黄面孔，吃黄米，喝黄水，身上沾着黄土，住在黄土的窑洞里，什么都不行。它咒骂全世界炎黄子孙公认的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代表——长城、黄河和龙，污蔑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光辉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宣传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总之，“黄种人的文明”衰落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黄河“孕育不了新的文化”。相反，“蓝色文明”是“新曙光”。它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的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说穿了，这个“新纪元”就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把这部片子推荐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值得一看。他还让有关单位复制500套录相带，广为发送。他们还垄断了舆论阵地，禁止发表批评《河殤》的文章。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得到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和拥护。1989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却有极少数人，明里暗里进行大量不正常的活动。

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同志会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长谈，被海外一些学者称为“历史性的会见”。接着海外报刊就透出一种舆论，说：“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信报》发表了题为《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一篇文章呼吁赵应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的某些文人政客也大造舆论，说什么“今日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所在，就是赵紫阳不拥有独裁的权力”、“赵紫阳独裁的障碍是邓小平”。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同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象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是为赵紫阳掩盖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1988年底和1989年初，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88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

1989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很得意地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1989年2月初，方励之、陈军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所谓“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题为《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显而易见，这伙人是想以释放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作为突破口，达到全

盘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

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题为《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攻击说：“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贴在北京大学的小字报《为中国人悲哀》，叫喊打倒“专制”、“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青年学生“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又贴出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这里的“改革”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院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里，“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内就搞了16场讲座。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晓叮请去，围绕“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在讨论中，他们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请李淑娴充任“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

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香港《明报》曾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它一语道破了极少数人已经在预谋、策划利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发动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攻势。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只是使这场酝酿已久的政治动乱提前到来了。

2. 极少数人利用悼念活动挑起动乱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各高等院校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在悼念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的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对集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送花圈的学生,政府不但没有加以阻拦,还派出公安干警协助维持秩序。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悼念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广大学生在悼念活动中表达的促进民主、整治腐败的愿望,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使这场风波一开始就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极少数人煽动并利用了部分学生偏激、冲动的

情绪，张贴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甚至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贴于北大三角地的一张无署名大字报说“政府无能，社会腐败，政治专制，知识贬值。这是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现实，当今的悲哀，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影射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是“独夫”、“橡皮图章”、“草包衙门”，攻击中央有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有的对中央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说“中国正在死去，人民正在堕落，一切都在死亡”，“让我们从那流着血的眼睛里发出血色的火焰，烧毁那可憎的世界”；有的攻击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是“欺世盗名”的“窃国奸雄”，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还说“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政工干部等”；有的甚至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还有的在墙上公开写“打倒共产党”，“中华民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叫嚷公有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专制的摇篮”，等等，扬言“让我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一些大小字报还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还有的大小字报、挽联，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四项基本原则。4月19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署名“社科青年”的《我们的呼吁》的大字报，其中谈到：“中国旧的政治体制象一辆破车难以驶上现代化之路，需要全面更新，却有人说，什么地方都可换，就是四个轮子不能换。”4月18日，人大贴出一副对联：“悼胡公，论赵公，哪及倒了李公；提千条，道万条，不如砸了四条。”不难看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多么的仇恨。